

国际关系学院简讯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ewsletter

2024年专报第2期[总第15期]

2025年1月10日

第二届北京大学全球政治经济论坛

暨《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修订本）》出版座谈会专报

为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庆祝王正毅教授《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修订本）的出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于2024年12月14日召开第二届北京大学全球政治经济论坛暨《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修订本）》出版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30余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出版单位的7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等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参会师生达百余人。

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朴世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原副院长、少将唐永胜，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柴瑜，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范蔚文，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霞，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张岸元，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胡宗山等嘉宾出席大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正毅，副院长张海滨、董昭华及学院相关教师出席会议。大会开幕式由唐士其主持。

唐士其欢迎各位嘉宾学者的到来，他表示，为推动学院科研学术发展，加强与学界同仁的交流合作，2019年起，学院启动了“北大国关学术论坛”系列活动，本届论坛作为第二届北京大学全球政治经济论坛，对国际关系学院的科研创新、专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学院与国内兄弟院校学习和交流的难得机会，他向所有关心与支持学院发展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期待各位专家学者发表真知灼见，开展精彩对话。

朴世龙首先代表北京大学对参会的嘉宾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对会议的举办、

《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出版表示衷心祝贺。他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危机，国际问题研究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决策观，科学认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及身份。他对近年来国际关系学院等院系聚焦上述问题开展跨学科、多视角研究取得的系列成果表示肯定，并希望进一步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最后他感谢各兄弟高校、科研院所对北大发展特别是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给予的深入指导，希望增进务实合作，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霞在致辞中代表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小文对《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出版并入选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表示祝贺。她指出，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是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领域最重要的几大丛书之一，《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修订本）一书搭建了中国社科界与国际社科接轨的桥梁，对世界体系论学术思想背景、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而长远的学术价值，呈现了中国学术界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术担当。

主题发言：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

开幕式后，大会进入主题发言环节。围绕“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这一核心命题，各位专家学者展开精彩发言。主题发言环节由王正毅主持。

李向阳从主流经济预测、短期影响因素和中长期转型压力三个方面阐述了亚洲经济增长的韧性与转型压力。他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经济今明两年的预测结果指出，亚洲经济增速稳中趋降。亚洲经济的韧性主要来自低通货膨胀率和降息空间以及中国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但也面临着金融市场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动转向的阻力。他表示，特朗普可能以贸易逆差为指标继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从而影响亚洲的供应链体系。中长期而言，亚洲经济面临转型压力，出口导向型模式面临挑战，需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重建供应链体系。

柴瑜从大国共性与发展、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全球南方中的大国作用三个方面探讨了在全球南方合作中发挥大国作用的问题。她认为，大国具有规模性、内生性、多元性等特征，而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具有灵活性、脆弱性和依赖性的特征。全球南方国家面临主体性问题，转变过去被动接受的发展模式、在未来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是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发展中大国可以为全球南方国家在提供稳定市场、实现战略自主、发挥协调治理机制、把握合作方向、提供分享式发展机会和注入内生潜力等方面提供助力。

杨志勇结合《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一书，从世界体系论的视角探讨了中国财政及其学科建设发展。他认为世界体系论中基于世界的考察角度、关注社会现实起源的研究视角、长时段的分析方法等，对现代化理论的实践、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国财政制度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都有启发意义。他表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学应该从实践出发，通过跨学科研究构建中国财政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张岸元分析了特朗普经济政策中的关税政策，探讨美国加征关税的原因、加征关税的结果及其未来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本质原因是对外增加联邦财政收入、对内减税。他从关税收入的流转原理解释了关税的复杂利益流向，认为除了贸易与国际收支的短期影响外，美加征关税的行为将在较长形势下对国家间的关税政策调整、货币汇率走势、企业海外投资、国家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存在影响。

唐永胜回顾了过去百年世界体系螺旋式、周期性的演进特征，指出当前变革的根本性与深刻性。他从世界体系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当今世界变局，认为世界历史进入到重要的发展阶段，国际秩序的转换不可能像以往那样通过大规模战争迅速完成，而是要经历新旧秩序并存的较长时段，需要对现有国际规则和秩序不合理之处进行有效的变革。世界体系论中的反体系运动正是促进世界体系朝着更民主、更平等方向转换的运动，不确定性增强的世界也将是未来面临更多希望的世界。

倪峰以“百年变局与特朗普再次当选”为主题，探讨了特朗普再度当选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系。他指出，历史上大变局通常以战争与革命的形态呈现出当时时代所积聚的各种矛盾；今天的百年变局与过去的形式不同，呈现出一系列排浪式的变化，他列举了 2016 年以来包括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两年一度的全球事件，指出特朗普的再度当选的特殊历史时间节点及未来变化趋势的不确定性。

冯仲平将欧洲放在世界体系中观察，分析了世界大变局中的中美欧关系。他认为欧洲人感受到权力和财富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二战后为了防止衰落选择联合自强。目前欧洲内外交困，面临经济持续低迷、传统政党政治失信与新型政党崛起、美国新政府在安全联盟和外交领域即将带来的新变化，欧洲希望建立统一资本市场与统一防务。中欧关系在今天的世界大变局中也在快速变化，更可能出现竞争不可避免、但合作领域也会增加的新常态。

杨光斌在发言中指出，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体系，全球化面临大变局需要转型、反思、重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经济掠夺式全球化，也反映在政治上以国

际制度推动的利益固化和文化垄断。列宁主义政党曾有冲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铁笼的先例。中国高度连续性的制度下，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中心之一并带来了价格革命，这意味着中国的全球化，中国推动的现代化把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从边缘地带带进了世界经济的中心。

胡宗山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释放的制度红利，以及随之带来的人口红利、技术红利和市场红利。四大红利释放的前提是两个中性，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意识形态中性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国家安全中性。他认为，未来需要持续深化改革，促进和释放四个红利，继续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方面的中性化处理，推动思想解放，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张宇燕在发言中指出，世界体系分析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运动，是研究社会现实的方法论，《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修订版的出版显示了经济与知识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在世界物质和思想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通过亚当·斯密定理到凯恩斯模型、再到索洛模型的发展，呈现了对国家财富性质与原因进行分析的国民经济学如何在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的推动下逐步发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从当前的全球性问题着眼设想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上午主旨演讲结束后，三个平行分论坛在下午举行。分论坛分别以“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大国竞争与经济安全”“世界体系与中国的角色”为主题，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范蔚文，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研究》主编谭秀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董昭华作为召集人进行主持。参会嘉宾开展了丰富且深入的交流研讨，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

分论坛一 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

分论坛一的主题为“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由范蔚文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小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方长平，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赵可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郑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党委书记魏玲，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全球治理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任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杰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国际关系系主任王翠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聘副教授郭洁，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欧亚研究室

副主任顾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卢晓依次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主任庄俊举，学院副院长张海滨作总结发言与点评。

张小明以《“世界体系”，还是“国际体系”？》为题进行发言。他辨析了世界体系、世界社会、世界秩序、全球治理等概念的内涵和适用语境。世界体系的分析单位不完全以国家为中心，而国际体系的分析单位以国家为中心。随着全球化的转变和大国战略竞争的回归，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影响了相关概念的使用。使用西方语境的概念对于中国的理论构建是否有益值得进一步探讨。

方长平以《世界体系转型中的美欧治理观比较》为题进行发言。他认为，从国家性来看，美国的体系管理强调结构性，其全球治理的方向将回归到国家利益；欧盟的体系管理强调的是中性，其全球治理的方向是从主权到人权，注重自由和民主价值观。从理论建构来看，美国是从全球治理出发，重视体系对国家的影响，强调机制性；而欧洲是从区域治理出发，有更多的文化和价值色彩。

赵可金以《国际体系、世界体系与生态体系及其理论建构意义》为题进行发言。他认为，国际体系是空间维度的概念，是缺乏时间维度的封闭体系，由此推出“历史是循环的”；世界体系是“进化的”，兼具时间和空间维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生态体系来源于中国的“天人合一”，同时借鉴了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尝试弥合西方学界左右派的理论鸿沟。

郑宇以《发展竞争时代的全球治理》为题进行发言。他提出了发展竞争概念，并把发展竞争与历史上的重商主义进行比较。从目标上来看，发展竞争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通过国家干预来促进发展，而不是通过保护的手段维护特殊的利益集团，打压其他国家；发展竞争是遵守现有的国际规范进行的，而不是在“丛林法则”下进行的。因此，未来全球治理的方向应该要基于区域融合，寻求共识发展。

魏玲以《全球南方兴起下的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为题进行发言。她比较了西方与东方视角、东南亚和中国视角下的反体系运动。她指出，多边主义 1.0 的危机反映了国际层面的合法性赤字，从而影响到参与方加入并支持多边机制。多边主义 2.0 的开放度更高，强调平衡国家主权与多边合作的内在张力。在全球南方兴起的背景下，应更注重国家间的利益协调，而非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从而构建多元协商的世界治理秩序。

刘丰以《当今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与限度》为题进行发言。他认为国际秩序

转型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力量对比的变化；二是跨国运动的兴起；三是霸权秩序的内部分化。旧国际秩序出现了松动，新秩序安排还要经历长时间的调整，权力转移的程度和范围（经济发展、技术扩散和军事力量的变化）、战略关系的分化与重组、战争和竞争的胜负等因素将影响国际秩序的重组和分配。

任琳以《全球治理观与世界秩序塑造》为题进行发言。她从观念和信念的视角来讨论秩序建构。在国际层面上，霸权稳定论反映了霸权国通过提供国际经济领域的公共产品来实现世界和平，美元的信誉和权威是世界经济秩序稳定的关键，而财政则是国内层面国家的稳定和繁荣的基础。在新秩序之下，美国不再维护货币的信誉，处理债务和财政的思路也发生了变化。新秩序的合法性取决于世界的繁荣。

朱杰进以《金砖之桥倡议与全球跨境支付治理》为题进行发言。他认为，利益偏好的协调和议题领域的特征是影响金砖国家合作的主要因素。“金砖之桥”是金砖国家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合作，分为传统跨境支付和数字跨境支付两种类型。在传统跨境支付领域，由于利益偏好不同、议题领域内西方国家的结构性权力强，金砖国家难以合作。在数字跨境支付领域，利益偏好趋同，议题领域西方国家的结构性权力弱，金砖国家有可能合作。

王翠文以《减贫与全球南方的发展合作：以中国和巴西为案例》为题进行发言。她指出，中国与巴西参与国际减贫和发展合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和经验，同时体现了全球南方的共性。作为新的发展合作方案，中国和巴西都强调南方国家的身份，在发展和援助理念上超越西方主导的援助方和受援方二元对立的垂直等级体系，提出了南南合作以需求为导向的横向伙伴关系模式，强调不干涉原则，强调平等和相互学习的对等型伙伴关系，重视发展三方合作。

郭洁以《拉丁美洲在权力重构中的角色：区域共识和未来路径》为题进行发言。她梳理了拉美国家在权力结构的重构过程中塑造话语权的困境和未来路径。从外部因素来看，拉美作为地缘政治缓冲的地区，美国和其他域外大国不希望在这一地区发生对抗；从内部因素来看，拉美国家的经济结构单一，区域一体化困难重重。未来，拉美国家需要发挥在多边机制中的领导潜力，比如巴西的金融影响力。

顾炜以《欧亚地区秩序的转型及其全球影响》为题进行发言。她认为，欧亚地区竞合平衡与相对稳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全球层次，欧亚地区对中美俄欧的差别化价值；二是在地区层次，地区领导权的妥善处置。一旦打破欧亚地区的竞合平衡并进入地区秩序转型，将会导致大国的阵营对抗、中小国家对冲空间的缩小、互联互通的断裂与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和欧亚地区的“分”与“落”。

卢晓以《联邦德国现代化进程与中德关系发展》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德国基于对战争的反思，在现代化过程中主要遵循了两个原则：一是谨慎克制，即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保持克制；二是联欧自强，深入融入欧洲。因此，战后的德国放弃使用武力，并将经济发展置于核心位置。这种发展模式塑造了德国的经济优势，推动了内部市场，拓展了外部的经贸空间，同时辐射了欧洲其他邻国，形成了德国在欧洲事务的影响力。

分论坛二 大国竞争与经济安全

分论坛二的主题是“大国竞争与经济安全”，由谭秀英主持。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高奇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杨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李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黄琪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学系主任左希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聘副教授陈绍锋，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张发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陈沐阳，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兆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徐沁仪依次作主题发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副主任李隽旸作总结发言。

高奇琦以《人工智能的大国竞争与经济安全》为题进行发言。他认为特朗普连任可能通过强化技术研发和数字货币来巩固美国的科技优势，中美技术竞争将加剧国际体系的重构。他提出人工智能可能加剧经济低迷，导致失业和全球分工体系瓦解，应该进行“分级治理”，限制超大模型扩散，调控一般模型使用节奏，强调国际合作与公平知识分配的重要性。

杨毅以《大国竞争与联盟经济新发展》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联盟经济有了新的时代内涵。美国扩大既有联盟关系，并以既有联盟框架为依托将联盟合作的议题拓展到气候变化、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和地区经济秩序等领域，强化联盟的战略效果，力图提升自身竞争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也增强了国家间的竞争态势。各国应根据联盟经济在深度和广度的扩展调整战略，以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李巍以《谁要脱钩？——中美经济关系与世界体系理论的创新》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弱国更注重经济安全以减少依赖，强国则通过经济自由汲取资源，这构成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强国也开始强调经济安全，中国的崛起正在对世界体系的固有结构产生影响，其中包含三个主要因素：独特的大规模效应、结合强国家能力与自由

贸易体系的双重优势以及高度自主的政治地位。

黄琪轩以《边缘迈向中心的曲折道路：“民族的”与“世界的”技术体系》为题进行发言。他强调，建立民族技术体系与融入世界技术体系的先后顺序是边缘国家迈向核心区的关键之一。通过对英国、美国等的成功经验和葡萄牙、西班牙、拉美失败教训总结，他认为优先建立民族技术体系可为技术自主奠定基础，而过早融入世界体系则易陷入技术依附。他指出通过技术积累和“引进—再创新”模式，中国有效构建了技术民族体系，为融入全球技术体系提供了支撑。

左希迎以《美国经济安全战略的社会根源》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美国当前经济安全战略的核心在于遏制中国崛起，通过贸易战、技术封锁和供应链重组排除中国，限制其市场与技术发展。美国的经济安全战略调整，既是对外部挑战的回应，也反映了内部社会结构的深刻矛盾。国际层面，冷战结束后，美国收割了源于苏联解体和信息技术革命的红利，但也因自由主义的反噬而出现制造业外流、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情况。国内层面，美国的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逐渐脱节、中产阶级萎缩与社会失衡成为长期存在的核心问题。

陈绍峰以《美欧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战略的比较分析》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美欧均强调降低供应链脆弱性并推动“去中国化”，但美国将关键矿产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欧盟则聚焦战略自主。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痛点在于加工能力不足、环境与经济成本矛盾及承担环保代价的意愿差异。美国通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强化供应链，但面临国内程序复杂问题；欧盟则将流程简化，但资金支持不足。他认为，美欧在供应链战略上的分歧为中国提供了调整和竞争的机遇。

张发林以《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回归东方？》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全球化具有联系性、传播性和趋同性三大属性，并提出两种动力机制：一是生产力的长期均衡趋势，即生产力优势会从优势方向劣势方传导；二是政治组织形态对优势扩散实施方式的影响。他探讨了新型全球化的可能性，指出当中国能成为生产力的优势方，并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念和国际关系理念向全球传播时，新型全球化或将回归东方。

陈沐阳以《债务主权治理：竞争与合作》为题进行发言。她分析了主权债务治理的两大机制：由IMF主导的债务管理机制，侧重协调弱国债务问题；以及巴黎俱乐部强调多边减债一致性的机制。她探讨了中国、美国和欧洲在现有治理框架中的立场，并提出两大关键问题，一是全球治理应通过大国协调还是新的多边机制实现，二是对中国而言，IMF是西方主导的组织还是中国可影响的国际组织。

陈冲以《基础设施建设与地方暴力：来自“一带一路”项目层次的证据》为

题进行发言。他以“基础设施供给如何影响当地冲突”为核心问题，聚焦于机会成本、经济增长和怨恨机制三条因果路径，提出了两个假说：第一，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方暴力具有抑制效应；第二，对非政府方暴力具有鼓励效应。他发现，“一带一路”项目并未显著增加政府主导的暴力行为，但怨恨机制显著增加了非政府方的暴力冲突。

陈兆源以《他国竞争的喜剧：大国竞争与对外投资安全》为题进行发言。他认为大国竞争为破解全球化“三难困境”提供了契机，发展中国家通过扩大政策空间和增强议价能力获得更多自主性。他以刚果金、越南和墨西哥三个国家作为案例，强调大国竞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主动调整外资规则的空间，使其在全球化中扮演更重要的“中间力量”。

徐沁仪以《大国新能源产业竞争与经济安全》为题进行发言。她指出全球新能源产业呈快速发展、生产模式重塑、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趋势，主要大国在供应链、原材料安全、规则标准以及技术封锁与政策方面展开竞争。她认为中国面对挑战应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本地化生产以适应美欧规则，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制定公平标准，强化关键原材料储备和供应链韧性，以应对外部压力并抓住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机遇。

分论坛三 世界体系与中国的角色

分论坛三的主题是“世界体系与中国的角色”，由董昭华主持。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刘雪莲，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李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党委副书记张建新，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任洪生，外交学院教授、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曲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田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外比较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徐秀军，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执行院长、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郭宏，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张东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聘副教授许亮依次作主题发言。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政法室编辑陈卓作总结发言。

刘雪莲以《全球化结构的延续与中国的作为》为题进行发言。她认为，全球化发展的体系结构存在延续性和稳定性，对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首先，全球化结构的资本主义底色弱化，但固有矛盾仍然存在，表现为经济危机；其次，新兴国家和主导性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在新的地缘政治竞争中体现为一种复合竞争模式；最后，权力流散产生国家和非国家主体间的共生结构，国家间界限

被打破，国内和国际的问题相互渗透，内政与全球治理相互影响。中国应继续发挥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把握技术动力，进一步推进全球化。

李滨以《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嬗变》为题进行发言。他回顾了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一百多年中经历的四个阶段及地位变化，即 1840 年后中国加入体系并处于边缘、1949 年起游离于两个平行体系、苏东剧变后重新融入体系，以及 2008 年中国从世界体系的外围向中心迈进。他认为现阶段中国迈向中心区面临着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变化，并指出未来中国在世界体系发展中的三种可能性：第一是中国成为世界中心，第二是中国对现行体系进行改造，第三是中国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体系。

张建新以《崛起大国如何避战：以英美霸权交替》为题进行发言。他从历史、现实和理论回顾了与崛起大国避战问题相关的讨论，总结 19 世纪末英美霸权交替对大国崛起如何避战提供的四点经验，即选择性的孤立主义、政策的非结构性、经济而非领土的扩张以及注重外交软实力。他认为，中国的行为和逻辑反映出中国所走的正是一条避战之路，因此中国的崛起是能够成功的。

任洪生以《半核心化：东亚区域发展的困境》为题进行发言。他以“半核心化”概念解释东亚国家迈向核心区的结构性变化，认为东亚主要国家在此过程中面临的三个困境：经济困境体现在国际贸易的生产竞争；政治困境是与核心区国家的制度性权力竞争；文明困境上表现为融入西方话语体系的困难。他提出三个指标用以衡量半核心区：经济上具有半边缘的特点、政治上具有核心区的角色、文明上具有进行反体系运动的潜力。

曲博以《中国全球共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为题进行发言。他认为全球共同发展在过去的知识体系中有两条路径，一种是单元视角，关注国家采取特定政策进行发展；一种是结构主义，关注“中心—边缘”的结构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他指出，全球共同发展既需要国家采用一定的政策去适应结构，也需要发挥大国的作用，中国从“十九大”报告提出“三个意味着”到“二十大”讨论中国式现代化，都为全球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向。

田野以《反体系运动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为题进行发言。他认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离不开两大动力，一是内部力量的演化与推动，二是对外部世界压力的借助与抵御。世界体系理论的“边缘化”和“反体系运动”概念为两大动力的运行提供了分析框架，他据此分析了中国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国家构建过程，并指出未来中国和世界体系的关系不仅会塑造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会影响世界体系的走向。

徐秀军以《世界体系变迁的产业链基础与中国角色》为题进行发言。他分析了世界体系政治演进的霸权兴衰与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体系之间的互动，指出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全球产业链经历了高端控制、节点控制和链段控制三个阶段，不同国家地位相应发生变化。他认为，当前数字时代的世界体系已经转变为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四维一体的世界，大国竞争越来越聚焦于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正在通过提高数字技术及数字产业链能力，进一步扩展在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

郭宏以《国际生产短链化：概念、趋势及影响》为题进行发言。他认为，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大国竞争、数字经济的加速、新冠疫情的爆发等因素叠加，使国际生产短链化倾向加速并走向普遍化，表现为全球价值链趋于收缩、跨国公司的跨国化指数趋于负增长、国际投资锐减和中间贸易品下滑等。这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应抓住机遇积极回应这一变化。

张东宁以《世界体系变动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实践逻辑研究》为题进行发言。他认为世界体系的分工所体现的结构性、竞争性和冲突性蕴含着联系世界体系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逻辑桥梁。总体国家安全观代表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有机融合，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统筹性和可持续性。面对资本、技术、劳动力、商品等要素流动引发的世界体系分工竞争，中国可以依据总体国家安全观，通过在经济领域、外交与国际合作领域以及社会与民生领域的分工优势，应对世界体系变动中的挑战。

许亮以《世界体系中的非洲与中非合作》为主题进行发言。他梳理了非洲参与世界体系的四个关键时间节点，即大航海时代作为世界体系的开端、柏林会议转向殖民帝国体系的建设、1940 年代到 1970 年代的非洲发展年代以及 21 世纪以后非洲的崛起。他指出非洲要适度地去全球化，才能更好地全球化。因此，非洲大陆自贸区可能是非洲的一个机遇。他认为，中国应当重视与非洲的经济合作，结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个路线进行对非投资，中非经济合作利大于弊。

吴昊以《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和中国的作用》为主题进行发言。他认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工作方法调整权力分配，在国家间实力变化的背景下实现有效性和权威性。执笔权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非正式权力之一，目前存在分布不均匀的问题，导致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意见无法被客观反映，影响安理会的决策民主化，限制了安理会工作的平等性及其对维护国际秩序稳定性的作用，因此需要充分推进安理会执笔权改革。

最后，陈卓分享了《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修订本）一书的成书过程及其对

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的意义。她提到，本书的出版是对中国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中政治学大类空白的重要填补，具有能够经历时间考验、兼具国际和中国视野的宝贵价值。她指出，商务印书馆同是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发展的见证者，一直与中国学术界并肩而行，辅助构建具有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也期望未来能够继续向世界展示属于中国的学术精神和成果。

大会总结由学院副院长张海滨主持。庄俊举、李隽旸、陈卓代表各分论坛作汇报总结。张海滨表示，在当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显著上升的国际关系大背景下，各位专家学者的研讨深化了对世界体系的理解，提出了有价值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加深了学术联系、凝聚了学术友谊。最后，他向与会专家学者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第二届北京大学全球政治经济论坛暨《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修订本）》出版座谈会至此圆满结束。

撰稿：陈静雯、艾雪颖、周芳源

张一、宋欣怡、马璐

审稿：王雨濛

院内资料 注意保存

主 编：祝诣博 闫 岩

责任 编辑：王雨濛

编 审：陈沐阳

编委会成员：王海媚 王雨濛 田田叶 冯 瑾 庄俊举 闫 岩 刘春梅

李睿璇 张春平 张昕扬 陈沐阳 项佐涛 祝诣博 崔晓旭

霍艳丽 魏西凝 （以姓氏笔画排序）